



# 补贴标准逐步提高到每月 3500 元,实际月收入却最终降为 2700 元 补贴提高收入反降,北京一村医维权获赔

本报记者 杨召奎

乡村医生,最初被称为赤脚医生。尽管已经很多人不再叫康丽赤脚医生了,但她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赤脚医生对待。因为 20 多年来,她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村民乡亲,尤其是现在村里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,留守老人和孩子疏于照顾,很多疾病需要及时治疗。为此,康丽也比从前忙碌不少。

虽然更忙了,康丽的收入却不涨反降。她说,1997 年时她每月只能从村里领到 200 元补助,到后来政府开始给补贴,并不断提高补贴标准,她的收入也涨到了 3000 多元。但当补贴标准提到了每人每月 3500 元后,她的收入却下降了。

为此,康丽找村里问原因,得到的答复是“村里有权统筹调整村民的收入”。她对这个答复不满意,在屡次交涉无果后,她与村里打起了官司。

康丽的遭遇并非个案。她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还有其他同事遭遇类似问题。她的援助律师张志友也表示,曾遇到过北京乡村医生补贴被克扣的案子。

政策明确:不得截留补贴

康丽告诉记者,从 1997 年开始,她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周庄子村的卫生室工作,当了一名赤脚医生。

“村里人谁有头疼脑热,都会找我看看。那时,虽然每个月只能从村里面领 200 元钱的补助,但我很知足。”康丽说。

后来,找康丽看病的人越来越多,病人也并不是简单的头疼脑热,康丽感觉到自己的医学知

识明显不够用了,于是又自考医学专科,并参加各种形式的医学培训,取得了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,从一名赤脚医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乡村医生。彼时,村里的卫生室也变成了周庄子村社区卫生服务站(以下简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),康丽这一干就是 20 多年。

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,方便农民就近看病,北京市从 2008 年起实施乡村医生补助政策,标准为每人每月 800 元。2013 年 7 月,原北京市卫生局、北京市财政局又联合出台政策,将这一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600 元,并明确规定该部分费用专款专用,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。

2013 年 8 月,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 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》,要求各地采取先预拨、后结算的方式发放乡村医生补助,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经费的 80%以上按月拨付给乡村医生,余额经考核后发放,不得挪用、截留。

康丽当时看到这些政策后,非常高兴。“自己工作了 10 多年,工资才涨了 1800 多元。没想到政府出台那么好的政策,工资一下又涨了 1600 元,一个月能拿到 3600 多元了。”

补贴提高到 3500 元,工资不涨反降

2016 年 3 月,《北京市关于加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》印发,将补贴标准又提高到每人每月 3500 元。针对山区、半山区的不同情况,各涉农区在基本补助基础上可再增加补助 500 元至 2000 元。

北京市卫计委基层处有关负责人当时对媒体表示:“目前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在 5000 元左右。此次调整后,山区村医的待

遇水平将与之持平。”

但补贴款再次提高后,康丽却没有得到实惠,其月平均工资水平更没有达到 5000 元左右。这是为何?

“我的工资都是村里发放的,补贴款提高到 3500 元之后,村里就找我谈话,说我每月从村里领 3000 多元的工资,又领取 3500 元的补贴款,相当于领了双份工资,对其他村民不公平,要求我将补贴款交回。”康丽说,虽然她很不满意,但也无可奈何。因此,在 2017 年 1 月前,她都向村里缴纳了每月 3400 元的补贴款。

但在 2017 年 2 月份后,村里不再要求康丽上交补贴款,而是从其工资里直接扣除 3300 元。康丽于是找村干部反映此事,但是村里迟迟没有解决。

法院判决,村里返还克扣款

无奈之下,康丽只好走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。2017 年 9 月,康丽向北京市丰台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,要求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她缴纳的乡医补贴款,支付按照乡医补贴款克扣的本人工资。

在仲裁庭审理阶段,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意退还要求康丽缴纳的补贴款,但是不同意支付克扣的工资。理由是按照双方劳动合同,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,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向康丽发放的工资符合合同约定。

2017 年 12 月,丰台区仲裁委认可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理由,裁决其退还康丽上交的补贴款,驳回康丽要求支付克扣工资的仲裁请求。

康丽不服仲裁裁决,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在庭审时,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

考勤表显示,康丽 2016 年每月应发工资为 5500 元,2017 年 1 月又调整为 6000 元,2017 年 2 月工资突然降低为 2700 元。

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表示,根据合同约定,双方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资,以经营状况和康丽工作情况计算奖金,最终合并结算工资和奖金。2017 年康丽应发工资降低的原因是,其属于非营利机构,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亏损,故降低了康丽的奖金数额。

但张志友律师指出,根据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第四条,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: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、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。因此,奖金也是工资的一部分,单位不能单方面降低康丽的工资。

2018 年 5 月,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,虽然劳动合同中约定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,但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工资表显示,康丽的应发工资在 2016 年是固定不变的,且时间较长,应视为双方已就工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。2017 年 1 月康丽应发工资为 6000 元,但是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降低为 2700 元,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,故不予采信。

最终,法院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康丽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期间乡村医生补贴款 3.4 万余元;支付康丽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工资差额 2.3 万余元。

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服一审判决,提起上诉。近日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,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,应予驳回。

发稿前,康丽告诉记者,她已经拿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。

吉林松原打造劳务品牌

让农民工高薪、放心工作

本报讯(记者柳娜娜)“五险一金都有,国家财政开钱,就业局给咱谈好了上班条件,不用自己操一点心!”11 月 26 日,在松原市就业局主办、前郭县就业局承办的省级劳务输出品牌务工人员欢送仪式上,即将赶赴南京公安局做辅警的于奇格外兴奋。与于奇一起,本次将有 60 名来自全市的务工人员到各自岗位高薪、放心工作。

松原市现有农村劳动力 100 余万人,在当地就业局的高度重视下,每年成功实现转移就业的超过 50 万人,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。

“作为就业部门,我们尽量为老百姓多找一些工资待遇好,生活环境好的就业岗位。”前郭县就业局党支部副书记赵佳告诉记者,就业局已打出享誉多省市的“前郭海员”、“前郭辅警”等劳务品牌。此次欢送的 60 名务工人员,将分别到南京市公安局、锦州华洋船员公司和沈阳铁路局工作。

据介绍,“前郭辅警”品牌就是为了解决广大农村退役士兵就业安置问题。目前,已累计输送六七百人,还有表现优秀者在当地升职、安家。

与“前郭辅警”的稳定、高要求相比,“前郭海员”则更具灵活性,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“农忙时种地,闲时出海,每月平均工资 1 万多元,活不累还能出去见世面,日子越过越好啦!”一位海员高兴地说。

松原市就业局明确提出,要将前郭经验和做法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推广,全力打造松原劳务品牌,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收致富、增长才干提供更多平台和机遇。

当粉刷匠、搞电商、做巡警……农村小伙多方打工,一改往日贫穷

## 脱贫青年的新目标:“脱单”

可。谁家粉刷或油漆的活儿,都愿意请他去做,这样下来一年也有七八千元的收入。”王炎勇介绍说,2017 年,刘军平又在九景衢铁路武山段做值班巡警,他每月可以拿 1700 元工资,其中 300 元交了社保。前几年,他还拿出全部积蓄在集镇上买了一间店面。

从送出去到接回来

## 安徽阜阳:“动脉”变迁铺就农民工幸福就业路

本报记者 陈华

本报通讯员 杨吕婷

辽阔的田野上,一列满载旅客的列车,徐徐进站。“亲爱的旅客,列车即将驶入终点站阜阳站,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……”冬季并非劳务大军找工的“旺季”,但是此时的阜阳站月台上,迎来送往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

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,总人口 1070 万,是全国著名的劳务输出发源地之一,也是全国五个人口超千万的地级市之一。

一座城市的欲望和追求,往往能从交通变迁上体现出来。改革开放 40 年来,阜阳交通建设实现了由“慢”到“快”的转变,阜阳的劳务大军也随着交通大动脉的节奏而加速流动的步伐。

“送出去”:农民工的艰难外出路

一张“硬板票”,一个巨大的蛇皮袋,就这样挤进逼仄、喧闹的车厢,晃晃悠悠一整天。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时的“标准”画面。当时,阜阳人多地少,自然灾害较多,群众生活

困难。同一时期,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发达地区生根开花,大量的工厂、餐饮以及建筑行业兴起,劳动力大缺口与经济高收入,成为吸引阜阳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的强大动力。

一个村有一个人出去了,就会接二连三带动更多人出去;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了,就会帮助更多的家乡人……民工潮如“滚雪球”般逐渐壮大。统计数据显示,在 1991 年至 1994 年民工潮形成初期,阜阳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已有 20 万至 40 万人。

初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,干不了太复杂的工作,这些务工人员只能做挑河挖沟的农工、建筑工地的泥浆工、码头的搬运工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计。通常都是哪里缺人了立马赶过去,那时他们总会身挑一根扁担,把被褥、炊具、粮食等能带上的东西都带上。

作为首批民工潮一员的刘影是 1991 年到北京闯荡的。“拎着蛇皮袋,穿着补丁裤,买不到坐票只能站 20 多个小时去,途中还要经历转车,扛着包裹赶车。”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故事,今年已经年近 50 岁的刘影偷偷抹了把眼泪。

“那时的火车站不像现在这么便利,人们出行特别困难。赶到‘三六九,往外走’的时候,站前广场上

滞留的旅客密密麻麻的。”阜阳火车站客运中心主任李成林介绍说,“当时铁路线路少、火车运力弱,为方便更多旅客乘车,火车几乎站站都停,耗时长成了家常便饭。车是经过改造的棚车,虽然配备了卫生间,但条件十分艰苦。”

1996 年 9 月 1 日京九铁路通车,不仅为阜阳带来了亚洲最大、全国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路网性编组站,还为阜阳构建综合交通枢纽奠定了基础。

1998 年至 2010 年,受铁路交通影响,阜阳民工潮人数猛增到每年百万人以上。阜阳市人社局数据显示,目前该市已形成 305 万(不含县内流动)劳务大军在全国各地务工经商,每年创收超过千亿元,劳务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。

“接回来”:返乡创业者的“春天”

阜阳火车站数据显示,当地民工潮 1992 年兴起,当年发送客流 21 万人次。2010 年迎来客流历史最高峰,发送客流 172 万人次。2011 年出现拐点,发送客流 164 万人次。之后,出现下降趋势,一路走低,2016 年春运发送 147 万人次,创历史最低。2017 年春运出现探底回升,发送旅客 163.5 万人。

“我市每年新增农民工 10 万人左右,2010 年就

近就业 21 万人,占外出务工人员不足 10%。随着‘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’热潮的到来,大量务工人员中出现返乡流,互联网颠覆商业模式,对零售业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影响,部分务工者出现跨区域、跨系统流动;私家车普及、打车软件兴起等吸引大量务工人员选择回家乡发展。”阜阳市人社局副局长董晓红介绍说,目前阜阳就近就业 70 万人,占外出务工人员近 20%。

为妥善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实际困难和需求,阜阳市先后出台促进返乡创业就业扶持政策。

2017 年,阜阳火车站与阜阳市政府联合开通宁波至阜阳 K8500 次“接您回家”免费务工专列。2018 年增开东莞东至阜阳 K4698 次“接您回家”免费务工专列。

“我经营的箱包公司自 2010 年开始在颍泉区试投产,投产后得到家乡各级政府领导们的关心支持,使企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,现在出口世界各地呢!”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刘生鸿激动地说。

眼下,阜阳两条高铁正在加快建设,计划于 2020 年建成通车。

“交通的便捷将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外地企业来阜阳投资,这对阜阳来说,必将开启一个发展的新时代。”董晓红说。